

苏轼的人生境界 及其文化底蕴

阮延俊◎著

桂苑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桂苑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苏轼的人生境界 及其文化底蕴

阮延俊◎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轼的人生境界及其文化底蕴 / 阮延俊著. —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4. 6

ISBN 978-7-5100-7999-3

I. ①苏… II. ①阮… III. ①苏轼 (1036 ~ 1101)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7853 号

苏轼的人生境界及其文化底蕴

策划编辑 刘婕妤

责任编辑 孔令钢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 www.gdst.com.cn](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61 千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7999-3/I · 0309

定 价 64.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洒 脱

——阮延俊《苏轼的人生境界及其文化底蕴》序

戴建业

本书作者曾是我带的博士研究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越南留学生，即将出版的《苏轼的人生境界及其文化底蕴》是他博士论文的修订本。

我带过的研究生中，有的已经是跨世纪人才，有的已经是教授博导，有的是单位里的业务骨干，但没有一人能像阮延俊这样多才多艺，没有一人能像阮延俊这样善于交友，没有一人能像阮延俊这样活得轻松洒脱，自然也没有一人能像阮延俊这样在人生的道路上独辟蹊径。

七八年前，他考入我校跟随林岩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三年以后又转入我门下攻读博士研究生。他的硕士论文是写苏轼的，在林岩教授细心指导下，论文获得我们教研室一致好评，毕业时被评为我校优秀留学生。读博期间他又想继续研究苏轼。开始我对这一选题比较犹豫，主要考虑到研究苏轼难度太大，博士论文比硕士论文要求更高。写苏轼虽然是个案研究，但苏轼一人留下的文章和诗词，比历史上有些短命朝代一代总和还多。苏轼思想上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诗文艺术上更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要阐释他的思想信仰及精神渊源，把握他的审美趣味和艺术特点，谈何容易！何况苏轼一直为我国读者所喜爱，一直是我国古代文学和思想研究中的显学，一般大众对苏轼相当熟悉，学者对他的研究更十分深入，对苏轼的每一个层面都反复耕耘，想再谈出点新意来需要深厚的功力。国内的博士生写学位论文通常都选一些二三流甚至末流作家，对苏轼这样的大家尚且“敬而远之”，何况阮延俊是一个海外留学生，他能否在三四年内通读苏轼？能否读懂苏轼？能否写出几十万字的论文？说实话，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怀疑。

和他一起相互学习的时间长了，我才知道他对我国儒家、道家、禅宗都有一定



了解，尤其对禅宗有较深的体悟，这可能与他在越南时出家为僧的经历有关。几次讨论后，他给我交来一份提纲，看了提纲我对他写苏轼就心中有数了。

延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可以说达到了迷狂的程度。他不管干什么事情都十分投入，读苏轼可谓“废寝忘食”，写苏轼更是通宵达旦。二年级下学期就写成了前两章，到三年级上学期他突然中断了论文写作，在外地给我打电话说他正在学中国古琴。我一听他放下论文去学古琴，在电话中便对他大发雷霆，并指责他干事“虎头蛇尾”。他在电话那头笑嘻嘻地说：“等我学会了古琴后，保证回校完成学业。”对这位博士生中的异类，对这位越南留学生，他的生活态度，我完全无法理解，对他的人生选择，当然也无能为力。

一年后，他抱一张古琴来见我，称自己现在不仅会弹中国古琴，而且会制作中国古琴，并说将来一定要把古琴琴艺带到越南，要让越南大地上响彻这种优雅的琴声。原以为这不过是他为了逃避我的批评，在我面前随便找的一个托辞，我对此只是一笑了之，根本没有把他弹琴制琴当一回事，还警告他要尽快写出论文。

延俊向来是文章快手，一经动笔便一气呵成，几个月后就给我交出了几十万字的论文初稿。我对这份初稿大体上还算满意，修改几次后提交盲审和答辩。答辩会上他不仅回答明晰流畅，还为答辩委员演奏了一曲《高山流水》，答辩和演奏都赢得了满堂喝彩。

该著从儒、道、释思想宗教的视角，论述苏轼执著而又旷达的生命境界，坦荡而又超然的人生态度，并揭示建构这一生命境界和人生态度的文化底蕴。全书五章围绕该中心论旨层层展开，首先阐述苏轼思想嬗变的内外因缘，分析儒、释、道对苏轼心灵的陶冶，接下来论述苏轼对儒、释、道思想的超越，再探讨苏轼对生的安顿和对死的超脱，最后解析苏轼的梦幻意识和对人际的关怀。该书从域外视角，写出了外国青年眼中的苏轼，国人忽视之处常是他着墨的重点，国人以为寻常之处常是他兴趣之所在，由于他能见人之所不曾见，所以时有出人意表的新颖之论。作为一个外国留学生的第一部专著，论证偶尔或不够周全，语言有时或不太规范，但这些小瑕疵无损于全书的学术价值。时相去近千年，地相隔上万里，阮延俊能与伟大的苏轼心心相印，并能成为苏轼的千年知音，东坡地下有知当掀髯而笑。

获得博士学位后阮延俊没有从事本行，没有回国教中国古代文学，而是选择留在中国弹琴和制琴。他对文学和音乐的悟性极高，不用花太大力气就能阅读中国古代诗文，稍加点拨就能识中国古代乐谱。对他的演奏技艺我无从评价，但他几次个

人古琴演奏会都好评如潮，他还特地请我欣赏过一场演奏会，连我这个音乐盲也听得如醉如痴。现在很多电视台请他演奏，各地盛大庆功会请他登台，文士艺人雅集请他助兴，他成了个分身乏术的大忙人。攻读博士时中国古代文学是他的专业，中国古代古琴是他的业余爱好，如今古琴反倒成了他的专业，而古代文学却成了他的“副业”。可能是怕我这位导师会产生失落感，他说中国古代文学还是他的看家本领，古琴有助于自己对古代文学的理解，古代文学能加深自己对古代音乐的体悟。但不可否认，古琴过去是他的个人兴趣，现在则是他的谋生手段。

他制作古琴的娴熟技艺真让人惊叹。他花一年多时间就学会了弹奏古琴，还学会了如何制作古琴。学习弹奏古琴尚有人指点，学习制作古琴只能凭自己琢磨，他的制琴技艺要不是无师自通，就肯定是来自天授。从选材到挑弦，从制作到调音，无一不靠自己细心揣摩体会。起初，他弹琴制琴是自娱自乐，不久以后便以琴会友，后来才以弹琴制琴谋生。他的古琴演奏广受听众欢迎，他研制的古琴更是供不应求，不少古琴演奏家弹他制作的古琴才得心应手，用其他琴行出售的古琴就很不习惯。他去年在武汉成立一家演奏和研制古琴的“南天坊”，招聘中国工人为他打工。他是中国的文学博士、古琴演奏家、古琴制作师。就国籍和民族而论，他是一位在华的越南人；但从文化上看，他比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还要“中国人”。

我曾到越南讲课一个星期，对那里的教育情况不太了解，但阮延俊反衬出我国自身教育的缺陷。从家庭到学校，我们的教育过于功利，儿童从小就懂得“无利不起早”，急功近利扼杀了小孩所有学习兴趣，为利而学是理性的强制，为兴趣而学才会有内在动力，孔夫子早就说过“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们的人生观更过于俗气，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就是金钱的多少和权力的大小，钱和权影响到考生的专业选择，左右了男女伴侣的挑选，有权丑八怪也可以二奶成群，有钱驼背老头也可以娶到明星。追求如此琐屑庸俗，人生自然沉闷乏味，有利时再讨厌的东西也两眼放光，无利时对所有事物都一脸漠然。无论是课内的学习，还是课外的补习；无论是写作文、做数学，还是弹琴、绘画、练字、打球，无一不是为了眼前或将来“有利”，从小都只盯着学了以后的“好处”，怎么可能对学习对象本身着迷？

阮延俊中止一年博士学业去学习古琴，并不是他事先就预判古琴可以挣大钱，是因为他太喜欢听古琴这种优美琴声，每听到古琴就遏制不住内心的冲动。学习制作古琴也没有想到将来卖钱，是由于他这个穷光蛋买不起昂贵的古琴，这才不得不自己动手。他学习弹琴和制琴从没有考虑过将来的“利益”，完全是着眼于个人的“兴



趣”，后来才无心插柳柳成荫。无功利则无往而不利，无目的才能完全合目的——阮延俊的生活态度实践了康德的审美人生，并实现了海德格尔所谓“诗意地栖居”。

他在读研期间踏遍了中国名山大川，他的朋友遍及南北各地，这让那些只知枯坐窗前寻行数墨的中国书呆子无地自容。这小子的出家生涯我不得而知，估计多半属于“醉中往往爱逃禅”那类和尚。他在中国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下巴美髯飘飘，口中吞云吐雾，完全是一副名士派头。他的朋友涵盖三教九流，他交友多出于情趣相投。他有一扬州铁哥们儿，有一天下午乘动车来武汉，彻夜清谈后第二天凌晨又乘动车回去，大有王子猷访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雅韵。

假如不能摆脱功利的生活态度，无权无钱固然活得很累，有权有钱又何尝活得不累？没有对利益的超越，没有对功名的淡然，就没有真正的洒脱，也不可能有高远的情致。

几年前他恭维我说：遇到我这样的老师他三生有幸；其实，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碰到了他这样的学生是我前生修来的福气。他的生活像一首优美的诗歌，而我的生活则是一篇又臭又长的散文。孔夫子说“礼失而求诸野”，我们现在很难有阮延俊那种轻松洒脱的心境。每一看到他我就会想起东坡那首适性任情的词作：“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2014年3月30日

于武昌

目 录

导 论	001
第一章 苏轼思想嬗变的内外因缘	005
第一节 历史的机缘	006
一、神宗与苏轼	006
二、哲宗与苏轼	012
三、变法与苏轼	015
第二节 个性的决然	020
一、野性论	020
二、尽人事论	028
第三节 仕途的际遇	034
一、科举之顺利	034
二、乌台之变故	040
第二章 儒、释、道思想对苏轼的陶冶	061
第一节 奋厉有当世志——对儒家思想的继承意识	062
一、经籍群书研习圆世志	062
二、儒者先贤效仿足我观	072
第二节 对佛家思想的观照	081
一、禅僧交游忘喜忧	081
二、释典阅览拔愚蒙	104
第三节 对道家思想的采摄	133
一、方外交游得逍遥	133
二、道典参研乐人生	142



第三章 苏轼对儒、释、道思想的超越意识	153
第一节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对儒家穷与达的超越	153
第二节 何必言法华，佯狂啖鱼肉——对释家思想的超越	160
一、现法乐住	161
二、平常心是道	167
第三节 苦热诚知处处皆，何当危坐学心斋——对道家思想的超越	173
一、顺其自然	174
二、无为心斋	179
第四章 苏轼对生死的超越意识	183
第一节 儒、释、道的超越生死理论	183
一、儒家超越生死的理论	183
二、道家超越生死的理论	186
三、佛家出离生死观	190
第二节 吾生如寄耳——苏轼对存在的意识与超越	193
一、生命之短暂的超越意识	193
二、以“寄寓”之心态安人生之万境	199
第三节 有生必有死——苏轼对死亡的意识与超越	205
一、有形必有坏	205
二、死亡的超越	210
第五章 苏轼的梦幻人生思想及其对现实的超越意识	220
第一节 苏轼诗词中“梦”之意象论	220
一、诗词中“梦”的考察	220
二、诗词中“梦”的意象	225
第二节 万事到头都是梦——梦与人生困境的超越	261
一、梦与黄州贬居生涯之安顿	262
二、梦与岭海贬居生涯的安顿	270
结 语	279
附 录	281
主要参考文献	321

导 论

佛教自从传入中国后，渐与本土儒、道二家相融合，先后经历了两晋南北朝时期以及隋唐五代时期的两次大融合运动。入宋后，由于统治者的主张、士大夫的推崇、三教人士的提倡等因素，这种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便进入鼎盛时期。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然而，在宋代文化发展巅峰背景下，不少文化大家身上都融汇贯通儒、释、道三家思想，如王安石、程颐、程颢、黄庭坚等，其中苏轼是具有代表性的大家之一。在他身上既凝结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兼综了各家学说的特点，并臻于融汇贯通的境地，其弟苏辙曾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曰：“（苏轼）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2]苏辙的这段碑文可以说是把苏轼学术见解的渊源作了一番总结和概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思想的嬗变，以及其儒、释、道三教融汇之情况。苏轼不仅是融汇贯通三家思想，无论是哪一家的学说，只要有用地都不介意去接受而变成自己的东西，清人赵夔也曾在《注东坡诗集序》中说：“盖胸中之书，汪洋浩博，下笔之际，不知为我语也、他人之语也，观者以意达之可也。”^[3]王十朋也在《注东坡先生诗序》中云：“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

[1]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2] 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90年5月版，第1117页。

[3] 引自苏轼撰，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附录二，第2832页。



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1]苏轼如此庞杂的思想，从其笔下之文字去了解其人乃非简易之事。历来学者对此歧见纷纭，或认为：“儒家的淑世精神是苏轼人生道路上行进的一条基线，虽有起伏偏斜，却贯穿始终。”^[2]或认为：“苏轼的学术见解，虽然旁征博引，参入了许多思想脉络，但他的思想体系的逻辑过程，应该说是嬗变于庄学，参证于佛学、禅学，而归于儒学。”^[3]或认为“奋力有当世志”的评价是不符合实际，而认为苏轼一生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人生哲学。中庸派则认为：“（苏轼）以佛、老之道治性养心而以周、孔之道治天下。”^[4]然而，爱之则不觉其过，恶之则不觉其善。如此之况，我们应当如何去解读苏轼呢？如何才可以避免陷入指木为林或见林失木的结果呢？

闻一多先生曾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5]闻一多先生的这种改变习惯性、以反作正的逆向思维方式重新解读问题，颇有见地。笔者从闻一多的这种以反作正的逆向思维方式受到了启迪，联想到历来学者对苏轼学术中儒、释、道思想的评价等左右分期的情况。我们不以或儒家、或道家、或佛家的思想角度去单一解读苏轼身上各家思想的表现，而以苏轼本人个性，根据他不同的人生阶段所具有的轻重不同之取舍，去解读儒、释、道三家思想在他身上的结合与运用，以此作为研究视角，定会不同收效。苏轼在继承与发挥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过程中，有着浓厚的个性色彩，以及个人人生经历的烙印，故若以儒、释、道修养及其超越意识为研究角度，来探讨苏轼人生儒、释、道，则会较为客观而可行。如果单从某个角度来观察其人生，难免失之于片面，当然不排除也可以做到单面进行深入研究，但本书更注重以宏观思想和摆脱局限性的方式进行研究，认为这样才不容易产生偏见。此乃本书研究意义之其一也。

其二，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道家和儒家是中国思想的主干，各个朝代对其有轻重之看法，存在崇此排彼的现象。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华传统思想的主干增加了佛家思想。虽然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矛盾，但在某种

[1] 引自苏轼撰，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33页。

[2] 王水照：《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73页。

[3] 唐玲玲、周伟民：《苏轼思想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

[4] 王懋竑：《读书记疑》卷十六《白田草堂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5] 郑临川：《闻一多先生说唐诗》（上），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54页。

程度上又是相通的。故从佛教传入中国后，三教合一的思潮从未平息过。尤其入宋后，三教合一的趋势则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宋朝的每个文人士大夫身上几乎无不具备这三家思想的因素，然而在他们思想上儒、释、道融汇贯通的境界各有高低不同。苏轼思想上融汇贯通儒、释、道三家思想表现在他有意识地继承而并不是盲目接受，有意识接受的过程就会产生出超越的境界。因为，苏轼在接受传统的时候，往往是考虑到其实用的一面，去建构他所追求的人生价值。当然，苏轼在他不同的人生阶段，对儒、释、道的继承和发挥则有不同的表现。那么，从继承与超越意识角度去研究儒、释、道如何参与构建其人生境界，将会避免走入分期的论证。

其三，苏轼的思想中除了具有三家思想以外，还有其他的个人思想，如屈原、贾谊、陶渊明、李白、杜甫、陆贽、白居易等人，不管是隐士、忠臣、狂徒，只要他觉得值得学，则无条件学之，但也决不是食古不化，而只吸收个人觉得有益的东西，去建构个人人生标准和生活方式。苏轼曾对陶渊明的人生抉择表示赞扬：“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赞扬其洒脱的为人处事。他也曾羡慕辨才禅师“去住两无碍，人天争挽留。去如龙出山，雷雨巷潭湫。来如珠还浦，鱼鳖争骈头”那样自在无碍的生活方式，虽然他也曾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逃世”思想，但始终不去做道士或和尚，也从未真正做到像陶渊明那样离弃人世，而是始终在不入不出之间，游于物之外，无往而不乐，在宦海沉浮、坎坷的人生中仍能保持着“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态，实现了出处自如、超越贵贱穷通的人生境界。当代学者李泽厚在其《美的历程》中对此曾如此赞美：“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其继承的超越意识，而其超越的思想无不从三家思想中来，因此，研究苏轼儒、释、道修养及其超越意识，则有助于理解苏轼思想上“庞杂”的一面。

其四，儒、释、道思想既然成为了宋代士大夫的思想体系的主干，而苏轼是一位集大成的诗人，那么他的思想体系难以从某种角度去概括之。然而以儒、释、道修养及其超越意识这样的宏观角度去研究，当然是一种冒险的选择，会容易多而不精，广而不深。为了避免这种冒险，笔者选择苏轼一生中，在儒、释、道继承与发挥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而明显的一面，去深入研究，藉以解读其人生。笔者认为任何一种多次重复而不是偶然、突出而不是平庸、明显而不是隐晦的现象都是事情的真实表



现。况且苏轼本人是一位“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耿直坦荡的忠诚者，从来不喜欢伪装，或扭曲自己为人，那么以他所表现出的比较突出的儒、释、道思想去研究其人，应该也是合理的推论。如此视角，既不失之于片面起见，也不陷入广而虚的高论。

基于上述管见，笔者欲以苏轼儒、释、道修养及其超越意识为研究角度，去探索建构其人生境界的因素，拟出其境界的真面貌，期望此举有助于苏轼作品解读工作和评价的参考。当然，至今研究苏轼者如丛林亦如大海，各家学说均有自己本家特色，然对于解读苏轼人生，因随着岁月的推移，研究资料日繁，而与其人之时代隔离日远。因此，研究他就会面对种种困难，以及不免会存在可商之处。本书若有所见，也不过是林中的一枝一叶，海中的一滴一泡耳，以此就教诸方。

第一章 苏轼思想嬗变的内外因缘

苏轼一生深受儒、释、道思想之影响，但其影响并非是均衡的，而是随着他的仕途际遇各有轻重之境地，他四十余年创作生涯中的作品表现出的思想十分杂庞，将其分期研究似乎成了自宋以来学界的争论焦点。古人则有二期、三期、八期之说。持两期说者以苏轼贬谪海南为界，将苏轼的创作分前后两期，如胡仔云：“余观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夔州以后诗，正所谓‘老而严’者也。”^[1]刘克庄曰：“惟坡公海外，笔力益老健宏放，无忧患迁谪之态。”^[2]元好问说：“子美夔州以后，乐天香山以后，东坡海南以后，皆不烦绳削而自合。”^[3]等等。持三期说者则以苏轼贬谪黄州及岭海为界，将苏轼的创作分为三期，如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4]陈师道说：“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然失于粗。”^[5]参寥说：“（苏轼）少也实嗜梦得诗。故造词遣言，峻峙渊深，时有梦得波峭。然无己此论，施于黄州以前可也。坡自元丰末还朝后，出入李、杜，则梦得已有奔逸绝尘之叹矣。无己近来得渡岭越海篇章，行吟坐咏，不绝舌吻。常云：‘此老深入少陵堂奥，他人何可及！’其心悦诚服如此，则岂复守昔日之论乎？”等等。持八期说者，如清人王文诰曾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识余》中将苏轼的创作分为八期：《南行集》和签判凤翔、熙宁还朝、莅杭守密、入徐湖、谪黄、元祐召还、谪惠、渡海。今人则有五期、六期、

[1]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

[2]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五。

[3] 元好问：《遗山先生苏轼文集》卷三十七。

[4] 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90年5月版，第1117页。

[5] 陈师道：《后山诗话》。



七期之说。持五期说者，如王士博等人，王士博在《苏轼诗论》一文中将苏轼的创作划分为：早期（1059—1068），杭、密、徐、湖时期（1069—1078），黄州、汝州（1079—1084），元祐时期（1085—1093），晚期（1094—1101），共五个阶段。^[1]持六期说者，有谢桃坊等人，谢桃坊在《苏轼诗研究》一书中将苏轼的创作划分为早期、凤翔时期、杭密徐时期、黄州时期、元祐时期、岭海时期六个时期。^[2]持七期说者，如王水照先生，他将苏轼的创作分为初入仕途及两次“在朝—外任—贬居”七段。^[3]

以上众说各有所是，均根据苏轼创作的多样、多变的风格而分，对创作风格而言宜细不宜粗，细方能勾勒出苏轼文学创作演变发展的轨迹，但对苏轼思想上的嬗变则不然，笔者比较赞同三期说。首先，“乌台诗案”的变故是苏轼思想嬗变的转折点，诗案变故在精神上给他带来了无比的打击，在品格上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污辱。诗案变故后苏轼展现的好像是另一种人生境界。其次，远贬岭海时期是苏轼思想的又一大变，如果说贬居黄州时期是他对人生价值思考从儒家建功立业转到生命存在价值之本身考量，那么贬居岭海时期，则更是追求精神上喜悦与轻安的内在深层体悟。可见苏轼的思想嬗变与他的人生经历关系密切，然而他的人生遭遇与历史和其自身的个性是相关的，下就此论述之。

第一节 历史的机缘

一、神宗与苏轼

苏轼一生为官，共遭遇了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五位皇帝，曾两度被贬。这两次被贬对苏轼的影响极其深远，几乎改变了他少年“致君尧舜”的入世思想。而这两次沉重打击分别是在神宗、哲宗两朝发生的，故欲研究其思想之嬗变，恐怕是绕不开与神宗和哲宗两位皇帝的关系的。苏轼的这两次被贬是他本身罪有应得的惩罚，还是神宗、哲宗对他存心褒贬呢？

据《宋史》记载，宋神宗“天性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4]，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神宗即位时，北宋王朝的危机达到高峰，军费开支庞大，官僚

[1] 详见王士博：《苏轼诗论》，载《吉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2] 详见谢桃坊：《苏轼诗研究》，巴蜀书社1987年5月第1版，第25—145页。

[3] 详见王水照：《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载《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

[4] 脱脱等：《宋史》卷十四《本纪第十四·神宗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3页。

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三冗”（冗官、冗兵、冗费）的情况日益加深，财政困难，造成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再加上与辽、夏的战争，时松时紧，虽因《澶渊之盟》、《庆历和议》两个条约情势暂稳，但每年之“岁币”亦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另外，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不断发生“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的农民起义，更加深了统治阶级的恐惧。因此，神宗即位后则采取了改革措施，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1]，寻找“富国强兵”之出路。然而宋神宗刚登帝位不久，尚缺治国经验，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后，就询以“不知卿所施設，以何为先”，可见他对变法尚无具体构想，故屡下诏书广求直言。

宋神宗对苏轼的态度，在宋人的笔记资料里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就是他对苏轼的态度是始终不一的。

熙宁二年五月，王安石向神宗提出变科举、兴学校，罢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取士的建议，苏轼应神宗的诏令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反对王安石的科举改革，他说：

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才，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2]

苏轼在仁宗朝以文才而得皇帝之欣赏，“朕今日得二文士，谓苏轼、苏辙也。然吾老矣，虑不能用，将以遗后人不可乎？”^[3]神宗刚即位，苏轼在他心目中还是“文士”的印象，加上上述奏折里的这一段，几乎证实了神宗对苏轼在仁宗心目中“文士”的印象。据《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记载，看完苏轼奏折后，神宗曰：“吾固疑此，今得轼议，释然矣。”即日召见苏轼论当时政令的得失。帝问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轼答云：“陛下求治太速，听言太广，进入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这时神宗对苏轼可以说是爱之有加的。苏轼心目中的神宗是怎样的呢？他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被神宗召见，

[1] 脱脱等：《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

[2] 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十五《议学校贡举状》，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23页。

[3] 方勺撰：《泊宅编》卷一，载《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3年版。



神宗欣赏的恩惠对苏轼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是贯穿了苏轼往后的仕途生涯。神宗给他的印象是一位识士之君、惜才之主，可以让自己实现“致君尧舜”抱负的一位皇帝。因此，后来苏轼屡次不顾自己所属状况之卑微上奏发表自己的意见，反对“新法”，甚至很多时候是跟皇帝唱反调的。皇帝的“容忍”可不是凡人的，后果可想而知，这注定了苏轼仕途坎坷的命运。

熙宁二年八月，苏轼与苏辙反对均输法，苏辙给神宗上书，反对王安石，并指陈其不可。《宋史》记载：“上阅辙状，问：‘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曰：‘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上曰：‘如此则宜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1]神宗对苏轼的这种不“合时事”颇为不解。是年十二月，神宗下旨开封府减价买灯四千余盏，苏轼便上书对神宗进行劝谏。他说：

臣伏见中使传宣下府市司买浙灯四千余盏，有司具实直以闻，陛下又令减价收买，见已尽数拘收，禁止私买，以须上令。臣始闻之，惊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窃为陛下惜此举动也。臣虽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穷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乐；尽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者哉。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然大孝在乎养志，百姓不可户晓，皆谓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凡陛下所以减价者，非欲以与此小民争此豪末，岂以其无用而厚费也？如知其无用，何必更索？恶其厚费，则如勿买。且内庭故事，每遇放灯，不过令内东门杂物务临时收买，数目既少，又无拘收督迫之严，费用不多，民亦无憾。故臣愿追还前命，凡悉如旧。京城百姓，不惯侵扰，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欤！可不畏欤！^[2]

这次劝谏是苏轼第一次直接冲着神宗的想法而唱反调。虽然言之有理，上书的动机也十分清楚，“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指陈得失，无有所隐者……皆知陛下不以疏贱间废其言，共献所闻，以辅成太平之功业”，以神宗召见他时曾说过的话作为

[1] 脱脱等：《宋史》卷十一《本纪第十四·神宗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

[2] 苏轼：《谏买浙灯状》，载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26页。